

毛主席的好儿子

——毛岸英烈士传略(三)

湖南省图书馆
长沙市图书馆 《毛岸英传略》编写组

六、在土改斗争中学习和锻炼

一九四七年三月下旬，岸英同志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安排，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东渡黄河，来到贺龙同志领导的晋绥解放区，先在山西兴县，后在临县郝家坡搞土地改革。当时，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正在新解放区逐步展开，中央土改工作团的主要任务是办试点，总结经验，以推进各解放区的土改运动。

郝家坡的土改工作开头是相当困难的。这个地方，从一九三六年开始，便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要地，十几年中，曾几度易手。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况，岸英和工作团的同志们一道，白天下地和大伙一块劳动，晚上访贫问苦，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经过一段工作，岸英对他分管的几十户人家的人口、家史、政治经济状况，均有了比较详尽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岸英等同志把贫苦农民串联发动起来，成立了农会，与农村中封建势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地主负隅顽抗，采取种种花样，转移隐藏财物，妄图逃避斗争。针对敌人的破坏活动，岸英和工作团的同志一起深入发动群众，耐心地做好后进层的思想发动工作，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对于

阶级敌人，则进行坚决的揭露斗争，实行政策攻心，造成敌人内部分化瓦解，终于挖出了地主分散的浮财。有个地主把家里的元宝用线缠成线团模样，买通送粪的人转移出去，埋在山里。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后，也被挖了出来。通过斗争，又进一步锻炼了群众。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郝家坡行政村的贫苦农民，积极行动起来，斗地主，分田地，伸千年冤，雪万年恨，掀起了一场土地改革的暴风骤雨，斗倒了敌人，教育了群众。对于这里的土改工作，毛主席后来曾给予了肯定。

一九四七年六月，中央土改工作团结束了在郝家坡的试点工作。八月，岸英随同中央工作团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全国土地会议旁听。十一月，由河北到达山东渤海地区李家桥，参加了渤海地区土改整党会议。一九四八年春节过后，又去渤海地区阳信县河流区张集参加土改复查工作，直到这年五月才离开。在初到张集时，岸英曾写过一首快板诗，表达他要使张集通过土改复查改变面貌的决心和信心。他这样写道：

“张家集上，
粗卤不堪设想。
六个虾兵蟹将，〔注〕
到此决心换模样。”

〔注〕指作者等六个土改工作团员

东头步到西头，
犹似走遍五洲。
马列主义在手，
细水变成洪流。”

土地改革运动是农村中翻天覆地的伟大斗争，是尖锐激烈的阶级大搏斗。岸英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斗争，把它作为进一步锻炼自己，熟悉中国农村情况，学会做群众工作的最好课堂。在土改中，他始终遵循毛主席关于“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的教导，深入群众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对于农村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特别是对什么是富农，什么是中农，两者的经济生活状况怎样，有什么差别，以及对待土改的态度，等等，都进行了精心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科学的分析，写出了几十页的调查报告。岸英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处处留心观察一切事物。有一次，他看到村里有三个小孩在一起玩，快晌午了，其中一个小孩说：“我不玩了，我要回家吃饺子去！”另一个小孩惊奇地说：“你家天天吃饺子吗？我们家只有过年才吃饺子哩！”第三个小孩噘着嘴，不大高兴地说：“俺家从来就没有吃过饺子！”岸英听了，敏锐地引起了注意，他仔细端详着三个孩子的衣着相貌，回住地后立即把三个小孩的对话记在本子上，并对工作团的同志说：三个小孩的对话，反映出三个农户的经济状况。岸英经常注意观察了解周围事物，善于“每事问”，村里发生什么事情，特别是新事物，他总要到场，寻根究底，弄清来龙去脉。他常到集上去，对编筐的，打铁的，炒花生的，磨豆付的，炸油条的，卖豆芽的以及其他各种摊贩，他都仔细观察，详细询问，如各种产品花多少成本？花多少劳力？赚多少钱？都详细记在本子上，认真

地进行分析。无论是在郝家坡还是在张集，岸英都深入群众，访贫问苦，掌握了大量详细的情况。曾和岸英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回顾这段战斗生活时说：“经过长期调查，岸英对这个村里每户的情况都非常清楚，从各户祖宗三代的情况到现在每家有几张床，灶门向哪面开都知道。”在调查中，岸英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作风，也是受到同志们赞扬的。他问一个工作队的同志：“你住那个村每人平均多少地？”那个同志不加思索地回答说：“两亩多吧！”岸英对他说：“你这个说法不科学，二亩一和二亩九都是两亩多，相差几乎三分之一哩！”正因为如此，岸英所在村向上级的报告，都准确实在，从没有虚报浮夸。

在土改中，岸英十分注意向群众学习，关心群众生活，走群众路线。在农会开会时，他经常对干部说：“先叫大家讨论，只要我们掌握得好，大家争来争去总会争出个道理来。”一九四八年春天，张集的老乡组成了“凑伙组”。当时，老乡们的生活还很苦，工作团吃菜也发生了困难。“凑伙组”想发绿豆芽供应工作团，既可增加群众收入，也可解决工作团的吃菜问题。但是，市场上没有绿豆卖。岸英主动向团部反映了这一情况，经团部的协助，地方政府卖给“凑伙组”一批绿豆，使困难得到了解决。为了做好群众工作，岸英很注意学习群众语言。在张集工作时，他搜集记载了渤海地区的许多歇后语、农谚、民谣等，在这方面狠下了一番苦功夫。

由于岸英虚心向群众学习，遇事同群众商量，注意调查研究，因而在土改工作中能够全面地、准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土改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张集划成份时，贫农张会山自报中农。岸英说：“你不应划中农，应划贫农。”老张却说：“我生活好。”经了解，原来这位老贫农在旧社会

受尽了地主恶霸的欺凌，但他对土改这场天翻地复的伟大斗争还不理解，有些疑虑，想报个中农不分胜利果实算了。岸英知道后，便对他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后来，张会山同志终于成了土改运动中的骨干，并当选为农会的会长。又如张集有一家人，平时雇短工较多，生活也过得不坏。究竟应把这一家划个什么成份呢？和岸英一道工作的一个同志出身很苦，见这家人雇过工，心里很不满，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就说：“雇工的都是有钱的，没什么好人，划个富农算了。”岸英说：“不行，我们得按政策来划。如果他家收入中剥削量不够百分之二十五，就不能划富农，如果超过了，就该划。”说完，岸英就和大伙一起认真地算起来，经过算帐和调查，这家的确不够富农标准，岸英就郑重其事地把他家定为中农，并对那个工作同志说：“我们不能凭感情办事，应按党的政策办事。你知道吗？我们在算帐的时候，老乡们也在算呢！如果他不够富农，我们草率地把他定为富农，那不是把自己的同志往敌人那边推吗？划错一户中农，它的影响绝不只这一户，而是影响整个中农阶层，违反党团结中农的政策，那会在群众中产生多坏的影响啊！”那个同志听后深受教育。在土改中，岸英对毛主席的指示，总是反复领会，密切联系实际，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对刘少奇等人在土改和整党中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对当时采取的“搬石头”、“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侵犯中农利益等一些错误作法，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一次土改工作会议上，他严肃地指出，那些作法是违背党的七大路线，违背毛主席思想的。同岸英一起参加土改的同志

回忆这段情景时说：“岸英很有政治头脑，很有见识”，“对问题有鉴别能力。”敬爱的周总理在中央机关一次会上指出：毛岸英同志在土改运动中的一些意见是正确的，很有学问，他攻读了不少马列著作，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在土改中，岸英始终坚持我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衣服裤子破了，他自己动手缝补，吃饭和漱口共用一个搪瓷把缸。每天三餐常常吃的是玉米饼、窝窝头，他吃起来却特别香甜。生活上从不提任何特殊要求，没有任何留过学、出过国的“洋”气。当时和岸英他们一起工作的还有华东土改工作团的同志，有的是从苏北根据地过来的，对渤海地区的生活很不习惯，有的人还有怕苦情绪，看到岸英他们是从中央来的，都这样的艰苦朴素，以苦为乐，心中非常感动。为了工作方便，岸英在土改中仍使用原来的化名杨永福。工作时间久了，老乡们都知道毛主席的儿子在工作团里，但谁也没把注意力放在艰苦朴素而又平易近人的岸英身上。直到工作结束岸英离村后，团部才告诉岸英的住户。住户听后赞不绝口，无比钦佩。

在整个土改运动期间，岸英始终坚持看书学习，努力提高自己。土改时，他的随身行李不多，但却带着一个大马搭子装书，其中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马列主义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汇编本、单行本，以及各种政治文件。此外，还有一部分中国历史书籍、文艺作品等等。他不管工作多忙，总要挤出时间学习。每天清早还经常诵读毛主席诗词和唐诗等。工作团的成员大多是一些理论水平较高并有丰富斗

争经验的同志，他们碰到重要问题，经常联系实际引经据典地进行研究、分析，有时还展开激烈的争论。这些讨论，岸英大都积极参加，态度认真，畅所欲言，能对实际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

岸英还很注意在实际斗争中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每个月都坚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书面汇报自己的思想。毛主席也在百忙中抽空给他回信，指导他，教育他。毛主席曾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八日给岸英回信说：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岸英用毛笔把它工工整整地抄在笔记本的第一页上，当作“座右铭”，经常学习，对照检查自己。他在一九四七年七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翻了一下还在郝家坡时写给父亲的信，信中有这么一段话，我来到郝家坡才两个月，已深刻感觉到自己长大了不少：土地改革工作中学习两个月所得的东西，要比蹲在延安机关学习两年还多”，“因为以前的无知，所以一切对我都成了‘新知识’，其中包括什么是黑豆，什么是谷子，什么是穷人，什么是地主，什么是农村里的茅房！至于什么是阶级路线，什么是群众路线，什么是斗地财，什么是干群关系等，更是闻所未闻！”“现在我似乎发现一个规律：当我的知识越少时，我的自高自大便愈厉害，知识的一步步增加，自高自大也就一步步减少。在郝家坡时的自以为是，自高自大，比起在苏联及刚回国不久时的情形已经好的多了。在这以前简直不知自己有多大本领！”他就是这样，密切联系阶级斗争的大风雨，认真学习革命理论，严格要求和检查自己，从不轻易放过自己的任

何缺点和错误。在总结这段时期的工作和思想时，岸英曾感慨地说：“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又集中到土地问题。通过这段工作，使我有深刻的了解。这段生活也是我最愉快的一段。我们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些，但过得舒服，过得痛快，很有意义。”岸英参加土地改革的这一年多时间，是他继续前进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的重要时期，是他在斗争中学会分清路线是非，抵制错误路线和政策，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重要时期，也是他思想上突飞猛进的一个重要的阶段。

七、从西柏坡到北京

一九四八年五月，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为指挥我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战略性的进攻和空前的大决战，离开陕北来到河北省建屏县（即现平山县）西柏坡。这时，岸英所在的中央土改工作团已结束了渤海地区的土改工作，离开了山东。五月，岸英到达了西柏坡，又一次回到毛主席身边，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编辑助理。在这里，他努力工作，先后与曹葆华同志合译了马克思主义在土地问题方面的极为重要的文献——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以及《苏联国民经济领导研究提纲》，协助曹葆华同志翻译了列宁的伟大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积极介绍和宣传马列主义。与此同时，他对日本投降以来的形势，包括各地报纸刊载的有关重大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摘抄和研究，以提供中央领导同志参考。从现在保存的他的笔记本中可以看出，在他摘抄的

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六年二月的三百多条资料中，有解放区战场的战况，解放区减租减息的情况，蒋伪合流的内幕，蒋介石阴谋破坏政协、挑动内战，等等。他在给刘思齐同志的信中曾谈到：这项工作对自己锻炼很大，使自己对国际国内形势有更深入的了解，然而感到内疚的是为党做的事情太少。在这段时间里他很注意用马列主义作武器，认真总结经验，象侦察兵一样搜索自己心灵的每个角落，不容许有任何政治灰尘存在。他在给自己的堂姐的一封信中，叙述了斯大林引用希腊神话中一个勇士安泰的故事后，写了这么一首诗：

斯大林把人民比作土，

离土即死近土生。

这话虽然响如雷，

直到今天我才弄清。

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我身上的缺点“其集中表现就是世界上很要不得的东西——骄气逼人。这一次同志们严格地教育了我一下，我的骄气似乎稍减了。我欢迎它的下降——下降到踏实！”

在一篇日记中，他写道：“这一两天，心里很不平静，它是由于我的社会地位与本身实质之间的矛盾上，前者是‘好得很’，后者是‘糟得很’！”

后来，在给外婆和舅舅的信中，回顾这段情况时，他更是严格要求自己，信中说：“……更有一层使自己万分痛苦的，就是几年来太不长进了。今后当努力奋发；不辜负生者，对得起死者才好。”“我从不希望由于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儿子，而受到特殊照顾，被‘另眼相看’”。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党区别

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毛主席的亲切教育下，岸英学习并坚持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使他的思想跃向一个新的高度。

一九四八年年底，我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挥下，以摧枯拉朽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围歼国民党匪军，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淮海、平津两大战场鏖战正急，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指日可下。在这时，党中央决定一待北京解放中央机关即移驻城内。为了保证中央机关的安全，保证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的安全，党中央举办了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为入城准备先遣队。岸英按照党的安排，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进入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学习。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北京宣告和平解放。第二天，岸英陪同两个扫雷专家，带领华北军区一个工兵排，作为中央机关的先遣队首批进入北京。他们的任务是消除中央机关驻地各种可能的不安全因素，诸如水电是否畅通，变压器是否安全，房屋桥梁是否牢固等等，他们都要细心检查，以防万一。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北京埋上了很多地雷，加之和平解放前夕，他们又把炮弹、手榴弹等弹药到处乱扔。要在很短时间内排除这些不安全因素，任务是艰险的。但是，岸英和同志们迎着困难往前闯。他们每天一早出发，一处处检查，遇到可疑的物品，岸英总是挺身而出，前去处理。三月二十四日，正当他们结束这天战斗，准备吃晚饭的时候，岸英接到一个电话，上级告诉他们一个特大喜讯：二十五日下午，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就要入城了，入城后，要先到颐和园休息，并在景福阁宴请各民主党派人士，因此命令他们

火速去颐和园消除各种不安全因素，无论如何要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绝对安全。

听到这一喜讯后，同志们立即放下端起的饭碗，乘上卡车奔赴颐和园。

车到颐和园，天已黑了。岸英和参加这项工作的老刘等同志一起商量，决定先检查室内。经过连夜突击，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室内检查工作告了一个段落。这时，红日高照，园内金碧辉煌的楼阁亭台，更加灿烂夺目，昆明湖面波光粼粼，映衬着玉泉山和西山的远景，愈加绚丽多姿。望着颐和园秀丽的景色，想到面临的光荣任务，大家心情无比激动。好大的颐和园啊！顺着围墙走一圈就是十八公里。几处制高点 and 邻近外面的土丘上，还有已破毁的敌军地堡、火力点，周围和路边的草丛中，还有零散的炮弹、手榴弹等危险品。说不定毛主席他老人家会到那儿信步走走。为了争分抢秒完成室外检查的任务，光靠一个排的兵力和一架扫雷器，显然是无法完成如此艰巨任务的。他们在突击清理地堡及周围地带的时候，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已到西郊机场检阅部队，眼看要到颐和园了。还剩下那么多大大小小的道路，怎么办？无论如何也要绝对保证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安全，做到万无一失。同志们真是焦急万分。这时，老刘对岸英建议说：这样吧，我们分成五人一组，胳膊扣着胳膊，划分方向，顺着大大小小的道路走他一遍，宁可牺牲自己，一定要保证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安全。”岸英欣然同意，大家坚决响应。于是，每组五人横列，各按着确定的方向，迅速往前踏去。岸英也和其他四个同志编成一组，一步步往前走。这每一步呀，都凝聚着战士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无比深厚的

爱，都表达了对党中央、毛主席的赤胆忠心。遇到可疑的地方，大家就更加仔细检查，经常是自己跳了上去，故意重重地踩几下，试验有无危险物，以确保绝对安全。

大家踩着道路，看着西苑机场，心情更加激动，互相高喊着：“加油呀！”忘记了疲劳和艰险，大踏步地向前迈进。五时左右，终于胜利完成了任务。当他们在大门集合时，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的车队已驶进颐和园内了。

先遣队的工作结束后，岸英到中央机关担任秘书。这个时期外事活动很多，岸英担任俄文翻译工作。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他继续刻苦学习中文，力求精益求精。有一次，岸英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报告会上担任翻译。他那流畅的中文，抑扬顿挫的声调，老练沉着的姿态，使得曾与他在山东一块工作过的一个同志为之惊讶不已。随后，很多单位都前来请他支援翻译工作。岸英在完成本单位的任务后，有求必应，深得大家的好评。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经毛主席批准，岸英和刘思齐同志结了婚。这时他已经二十七岁了。本来岸英与刘思齐同志早在一九四六年在延安时就认识了。在长期的斗争生活中，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产生了革命的爱情，原计划在九月份结婚。后来了解到十月一日要举行开国大典，事情很多，忙不过来。岸英便对刘思齐同志说：“我们的喜事不要赶在前头，还是先国家后自己吧！”于是便把婚期推迟了半个多月。结婚时，房子里桌椅板凳等家具都是临时借公家的，就连两床被子也是从本单位借来的。婚礼进行得简朴而欢乐。毛主席参加了岸英的婚礼，并把一件大衣送给岸英，亲切地对小刘说：我没有

什么东西送给你。这样吧，这件大衣白天岸英穿，晚上你盖。

婚后，岸英和刘思齐同志在不同岗位上并肩战斗。他一如既往地废寝忘食、一丝不苟地工作，对自己生活很少注意。在工作中坚持党的原则。当时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不少亲友经常写信给岸英，有时直接到北京来找他，要求安排工作。岸英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严格要求自己的亲戚和朋友。他处理问题，总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大公无私，处处为革命着想，从不讲个人情面。根据党的原则，对应当和已经安排工作的亲友，岸英总是经常勉励他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继承先辈的遗志，发扬革命传统，努力克服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不好的东西，勤勤恳恳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并帮助他们从头干起，从小事干起，先向别人学习，决不讨厌做小事，决不好为人师。他曾严肃地对一位亲友说：“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很好听，很容易，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特别对于有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而没有受过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更是这样。”有个亲戚曾托别人要求岸英帮助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岗位。岸英针对这种思想给这位亲戚的亲属写了一封长信进行尖锐的批评，并指出：“反动派常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

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引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接着，岸英在信中坚决表示：“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极平凡的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岸英对同志的缺点错误，总是坦率地严肃提出，但又非常注重团结，坚持治病救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他在的一封信上写道：“只要是革命的和愿意革命的同志，我们就要多注意团结（当然不是无原则的团结），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更没有没有缺点的人，但错误和缺点可以慢慢改掉的，如果对方有缺点，犯了错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表示不满，甚至愤恨，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是以明确的立场去分析对方犯错误的原因和环境，并且用各种方法去帮助他逐渐改正这个错误，或者去掉这个缺点。”

从这两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到岸英那种坚定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大公无私的优秀品质、光明磊落的共产主义胸怀以及革命原则第一的精神。这些都给他的青春的生命增添着灿烂的光辉，值得好好学习。

略谈屈原、《离骚》及其他

辛 宇

屈原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位伟大诗人，也是受到全世界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他曾被流放到江南，先后到过长沙、辰溪、溆浦以及湘、沅、澧下游各地，后来还在汨罗江畔住了一段时期。他的作品有不少是在湖南写成的。为了纪念这位爱国诗人，历史上，每当端午节，湘江、汨罗江一带的人民用龙舟竞赛、吃粽子等方式来寄托对屈原的哀思，形成了传统的风俗习惯，并传播到了国外，如朝鲜、越南、日本、马来亚各地。

(一)

屈原，名平，字原，是楚王同宗的贵族，大约生于公元前340年左右。他所处的时代是我国战国的后半期，当时封建割据，七国纷争，战争频繁，楚国正由盛转衰。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卓越才能的屈原，曾任三闾大夫，年轻时，就担任了楚国的“左徒”，对内和楚王商量国家大事，制订国家重大法令；对外应接各国诸侯等贵宾，处理外交事务，很得楚王信任。后来，由于贵族上官大夫等对他进行谗害，污蔑他泄密和夸功，楚王发怒，疏远了屈原，并撤了他的职。

公元前313年，楚怀王受到“连横家”张仪的欺骗，绝齐亲秦，后来发现上了当，就发兵攻秦，吃了大败仗。魏国乘机偷袭楚国。楚求救于齐，齐坐视不救，楚国处境十分狼狈。这时怀王决定重新起用屈原，派他去齐国恢复友好联盟。屈原去齐国后，张仪又到了楚国，买通靳尚等劝楚王背齐亲秦。屈原出使回来，力劝怀王不可听信张仪的“邪说”。

公元前311年到公元前309年，秦国连年

攻楚，楚屡战屡败，丧师失地，国力急剧下降。后来，秦昭王要求楚怀王到武关会亲，屈原看透了秦国的本性和用心，谏怀王说：“秦，虎狼之国。不如无行。”怀王没有采纳屈原的意见，却听了小儿子公子兰的话，前往秦国。一进武关，秦国伏兵立即截断怀王的归路，扣留了他。三年后怀王困死于秦。

怀王入秦后，其长子顷襄王继任，公子兰当了令尹（国相）。他们对屈原又恨又怕，很快把屈原流放到了汉北。屈原看到楚国国运危殆和自己身受的迫害，忧心如焚，忿恨不已，写了《抽思》、《天问》等作品。《天问》非常奇妙，一口气对天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天文地理、神话传说、历史现实、个人境遇，无不涉及，问得圆转活脱，参差有致，高远神妙，发人遐思。在对天的责问和对旧的传统说法的怀疑中，体现了屈原的唯物主义倾向和对黑暗政治忿恨的激情。不久，屈原开始写《离骚》，约在五十岁左右写成。

楚国在顷襄王统治时期，政治更加黑暗腐败，人民生活非常穷困。爱国臣民都怨恨令尹子兰，因为他曾劝怀王入秦以致楚国蒙受到奇耻大辱。屈原更是憎恨子兰。《离骚》中“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我以为兰花总很可靠，却原来它不实在光有外表。”）就是对子兰的批判。子兰得知，勃然大怒，便唆使上官大夫到楚顷襄王面前对屈原进行诬蔑、攻击，顷襄王大怒，把屈原流放到更远更荒凉的江南。

屈原前往江南时，路经江滨，曾与渔父有一段问答，表达了他“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慨叹，和他“宁赴常